



紅線間 (攝影) 俞雪萊

乾爸

人生在線

童年的冬天總是很冷。泥濘的鄉道上結了冰，太陽照下來，白晃晃地扎眼。鞋是布底的，早上出門時，母親就交代了，別穿布鞋出門，太陽出來後，路上的冰化了，布鞋就濕了。我小時候頭皮着呢，怎肯聽母親的話，早就跑遠了。手裡拎着兩個禮包，一個裡面裝着白糖，一個裡面裝着雪餅，這是持續了很多年的禮包，大小、包裝、價格幾乎是一成不變的。大年初二那天，我要拎着它到離家五里地的乾爸家拜年。

乾爸瘦骨嶙峋，一到冬天總是咳個不停，每年去，還沒到家門，就聽乾爸在咳，一聲接着一聲。但乾爸仍然要喝酒，一小碗，是自家釀的紅薯燒，顏色是焦黃的。乾爸本來已有四個兒子了，但對我這個最小的「兒子」，仍然禮數有加，把好菜全部放在我的面前，而且一定要讓我吃一塊肥肥的扣肉，每年如此。

按照我們那地方的風俗，扣肉在整個春節期間是不能隨便吃的，如果有那個不諳世事的客人，貪嘴吃了扣肉，就會被人家念叨一年。而乾爸的舉動，直到成人後，我才理解他是給了我最大的禮數。

乾爸的壓歲錢總是十元，也維持了很多年。我總是按照母親交代推卻幾次最後才收下。然後沿着山路回家，一路上總是掏出那十元錢來瞧，真的很開心。

乾爸給我最後的十元壓歲錢，我已十三歲了。乾爸躺在病床上已無法下地了。那頓飯因為乾爸不在飯桌前，沒人夾扣肉給我吃，乾爸和幾位大哥也都心重重。吃了中飯，大哥讓我上樓，說乾爸在找我呢。上了樓，乾爸從被子伸出一隻手，手裡捏着一張十元紙幣，說：「拿着，乾爸給你的，以後啊，乾爸也許不能給你壓歲錢了。」

乾爸瘦得脫了人形。雖然只離了五里地，但兩年一年只走動一次，除非出大事了。出大事那年，我十三歲，是乾爸家的大哥走路來的，一進家門，就嗚咽起來，對我爸說：「我爸沒了。」

作為「兒子」，我也參加了乾爸的葬禮，農村裡的葬禮有許多複雜的禮節，一個十三歲的小孩自然應付不過來。是母親陪我去的，他們給我戴上孝服，讓我在乾爸的靈前叩拜。我心裡沒有一點悲傷，只聽得我的幾位大哥一直嗚咽着，那種聲音就像一隻落單的狗遭到圍獵時發出的聲音那樣，這種聲音至今仍然歷歷在耳。

乾爸就這麼沒了。此後我讀了初中、高中，考上了學校，到了城裡工作，有了一份體面的工作。這二十多年，我很少會想起我的童年時光裡，曾經有過一個乾爸，他總是給我十元壓歲錢，給我吃美味的扣肉。

直到有一天，乾爸村裡的一個老鄉，也是乾爸的堂弟，輾轉多人打聽到我，託我幫他在城裡辦點事。他坐在我的辦公室裡，有些局促不安，怕我不肯答應，其實他的那點事不過是一個電話的事情，當場就幫他辦好了。他真的很高興。他對我說：「我堂哥在世時就經常說，我那四個親生兒子不讀書的料，我看哪我那乾兒子以後肯定考上大學當居民。」

剎那間，我的腦海裡就浮現出乾爸咳嗽的形象。他還在說：「後來你考上了學校，你的幾個大哥別提有多高興了，說咱家出人才了。」

這是我從未聽說過的，是在我過了這不惑之年。自從乾爸過世後，加上我一直在外工作，我和幾位大哥也很少走動。春節我開車路過乾爸所在那個村子，村裡的許多房子因為建造公路已經拆遷了，我把車停在了路邊，看着南邊的山巒，記得乾爸是葬在山巒下的。山巒裡霧茫茫的。招指算來，乾爸與我已隔了三十二年的光陰，而我是在三十二年後才開始為乾爸悲傷。這種悲傷，無法言說。淡淡的，卻是沉重的。

異化的生活

葉周



如是見

現代社會中人的溝通方式越益多樣化。我寫了一個電子郵件給九〇後的女兒，幾天都沒有答覆。我又再發了一個手機短信給她。她終於聯繫上了，她還準備我通過微信發出的呼叫怎麼都沒有回應。這就是e世代人們溝通的多渠道的複雜性。溝通的方式越來越豐富，可是有時候彼此不在一條通道上，似乎又很難相遇。

人與人的溝通交流從原先的書信發展到電話，現在的互聯網更把全世界網絡在它的連接中。稍後的WiFi無線上網更提供了不受區域限制的即時通訊手段。如今人與人不論空間距離如何遙遠，都可以在瞬間通過現代的電子設備連接，及時互相溝通。可是曾幾何時，人與人又開始過度依賴電子通訊手段，手機幾乎在某種程度上取代了人們面對面的交流。生活中常見的奇怪景象，一家出遊，到了旅館，不論父母，還是孩子，每人都面對一部電腦或是手機，各取所需，自娛自樂。咖啡館中，情侶或友人近在咫尺，卻聽不見交談，不知是吵架，還是表達愛意欲說無語，只能仰賴手機短信你來我往。手機成了人與人之間不可或缺的中介，心裡有什麼話寧願與手機說，也不願兩眼相望，對着活生生的人表達。

手機是一個沒有生命的電子產品，不會對人有不敬的反應，與手機對話不至於有什麼心理負擔。況且對手機表達，甚至都不用開口，只要按鍵輸入，就可傳遞訊息。如此這般即便是對方通過手機反饋回來的訊息，也已由手機過濾去了語調中的情感，面部表情上的戲劇性變化。大家都習慣躲在屏幕後面，聽不見語音，看不見容顏，只留意字裡行間的含義，並透過字裡行間去揣測對方的真正意思。人們似乎覺得更安



無距離通訊

(網上圖片)

全地受到了這種時興交流手段的保護。

這種與時俱進的現實生活方式，其實已經越來越明顯地昭示着人的異化。而所謂異化，究其根本就是人用非凡的才智創造了產品，可是產品帶來的生活方式的變化，卻使人越來越機械化的被產品所操縱。這種異化不僅體現在人們對於情感和物質的態度上的不斷變化，而且人們互相之間的關係也隨着溝通方式的迅速變化而體現出明顯的不同。

科技的進步使我們生活增加了便利？還是導致我們作為人的肢體和腦力功能的退縮？在現代科技面前，有時我們顯得那麼軟弱，對面臨的傷害表現得那麼無奈。當我們的身份證號碼、銀行帳戶密碼等其他個人隱私的資料，被黑客所偷取，我們惶恐莫名，卻都不知道對手從何而來？又如何去防範。忽然之間，從自己郵箱中發向朋友群的求救信，歷歷地遭窺，身無分文的窘境，等着朋友慷慨解囊。等接到連串的慰問電話，自己還蒙在鼓裡。這不就是人類時常碰到的窘境嗎？

美國著名哲學家埃里希·弗洛姆在他的著名著作《在幻想鎖鏈的彼岸——我所理解的馬克思和佛洛伊德》一書中曾有過精彩的論述：

黑格爾第一次提出「異化」這個概念實質上是指人逐漸地與這個世界（自然、事物、他人以及人本身），人並沒有把自己當作是自身行為的主體，當作是一個能思考、有感情、有愛的人，人成了客體，這個客體正是人自身力量外化的體現。因此，人只能在他創造的產品中認識自己，只能通過順從於他的創造物中接觸到自己。

後來馬克思受到黑格爾的影響，又進一步闡述了勞動異化的問題。「勞動者生產的財富越多，他的產品的力量和數量越大，他就越貧窮。」他在這裡特別強調勞動者與自己創造的產品，就像同一個異己的對象的關係一樣，異己的對象世界越強大，他本身內部的世界就越貧乏。

其實人類的窘境遠不止這些。人是感情的動物，現在連感情也都難以自控。最聾人聽聞的新聞應該屬

於德翼航空A三二〇被人為毀毀阿爾卑斯山，至今調查發現是副機師盧比茨失戀所導致。

失戀對一個人的打擊有多大？以往我們曾經聽說過失戀者去傷害原先所愛的人，現在這些損害更趨激烈，殺人分屍也常有所聞。為愛不成，似乎非致對方於死地而後快，不然絕不罷休。所以人們時常會質疑，愛情究竟是一種緣分的愛的感情？還是荷爾蒙作祟時的情緒亢奮？極端的愛情如此容易走向毀滅的瞬間，難道荷爾蒙作祟的「愛情」離開仇恨只是一線之隔。

可是德翼航空的副機師盧比茨卻更是一朵奇葩，此次他沒有去傷害失戀的女友，卻是隱瞞了醫生開給他的情緒抑鬱的病假單照常上班，從最新的調查顯示，是他蓄意製造了這起機毀人亡的慘劇。飛機起飛後，他在機長的咖啡中投放了利尿劑，然後多次催促機長去上廁所。隨後反鎖駕駛艙門，阻止機長回到駕駛位置上。利用機長不在的十多分鐘，他按下了飛機急速下降的按鈕，最終導致飛機撞山，機上一百四十九名乘客和機組成員全數罹難。

年僅二十八歲的盧比茨的行為何等瘋狂，他的心又為什麼這麼冷酷。當他按下飛機急速下降的按鈕，對講機中傳來地面指揮中心的呼叫，飛機操作系統發出了警報，還有門外機長的大聲呼叫和猛烈撞門……所有這些聲音可以匯聚成極強烈的心理衝擊力，可是他依然無動於衷。從黑盒子中的錄音中可以聽到，他呼吸的機率都不會改變。殺人竟然可以如此大氣不喘、毫不眨眼。

逐漸的盧比茨背後的故事被報道出來。盧比茨剛剛經歷了一次失戀，與他同居的一位空姐不久前與他分手。這個名叫瑪麗亞的二十六歲女與盧比茨在工作中結識，去年兩人還長時間一起飛過歐洲航線。瑪麗亞和盧比茨相戀七年，原本定於明年完婚，

但空難發生之前不久，瑪麗亞卻提出與盧比茨分手。原因是她覺得盧比茨過度抑鬱，神經有些不太正常，而且行為極其古怪。「他經常半夜醒來，然後高叫『我們要降落了！』這讓我感到恐懼。」瑪麗亞於是決定離開他。

瑪麗亞說，盧比茨曾經跟她說過，「總有一天，我會做一件事，改變整個世界，讓每個人都知道我的名字，然後記住我。」瑪麗亞說，當時她對於這句話並沒有太在意，但如今卻一言成讖，「當我聽說這起空難之後，這句話就像一盤錄音帶一樣在我腦海裡反覆播放。」盧比茨說這話的時候，顯然去意已決，那一個最後實現了的恐怖夢想已經在他心裡醞釀。無疑現在世人都知道了他們的名字，也會記住他。但是記住的是他的另一個名字——邪惡、冷血。

據德國《焦點》雜誌報道稱，在空難發生前幾周，盧比茨在杜塞爾多夫的一家汽車經銷店斥巨資訂購了兩輛豪華奧迪車，其中一輛已於空難發生前三天交付。據稱，這兩輛車是盧比茨為他和前女友瑪麗亞精心挑選的「情侶款」，一輛給自己，而另一輛則是給瑪麗亞。盧比茨這樣做顯然是為了挽回已經拋棄自己的女友，而且此舉也被看作是他的最後一搏。可是事發後瑪麗亞在接受採訪時表示，自己並未收到盧比茨送的豪華車，她對豪華一事也完全不知情。足見盧比茨的最後一搏並未奏效。

盧比茨究竟是因為失戀導致抑鬱，還是因為抑鬱，行為古怪導致戀人離去？值得研究。如果是前者，則是人的另一種異化現象。因愛生恨的邏輯是什麼？是因為失去愛的人，有一種被拋到空中無法自控的失重感，失去愛便如同失去所有人生的依託，人生的意義，自我的價值評判和對自己人生價值的判斷都徹底蕩然無存。這時人的主體已經不是他自己，而自己已經異化成為一具喪失理智的行屍走肉。而如果是後者，則是現代醫學的難題，屬於病理因素使他在女友眼中失去了被愛的價值。可是他又從何獲得了那種不可理喻的瘋狂的力量，如此鎮定地去進行殺人的惡行？埃里希·弗洛姆說：「在現實生活中往往一個比

「文革」期間我在上海，那個一千多職工的工廠，批鬥了二百人，發生於三月到中國事件。在境外的工廠，批鬥了瘋狂，以至於提到了中國大陸。他們馬上就聯想到這些「運動」，中國人莫非是另類人種。其實我們都是正常的人，只是被「專了政」；再一尋思，那些專我們政的，也都是正常人。被「專」的對象以笑話的事件。廠裡辦了一期「批鬥式學習班」，先批鬥的對象自己帶了被褥，住在廠裡的一期「批鬥式學習班」，革命青年辦「學習班」，學員都住在「班」上，不回家的這個名稱相當「諷刺」，因為我們都是「牛鬼蛇神」。半夜，旁邊睡的青年人章伯勳，我緊緊地對我耳語：「你講夢話對了一位女學徒「吃豆腐」（上海話，意指「開帶調戲的玩笑」）。「文革」需要形成革命聲勢，找他敲打一番。第二天吃過早飯，不要他提出來批鬥。那天他突然變態，滿不在乎地說：「你們不要急嘛，蹦蹦跳跳開開會，還遠地走到窗外，推開窗子，一腳跨到窗沿上。參加批鬥會的章的師父張某後來說，見此情景，他腿都軟了，站不起來，只抖抖索索地喊出了「你、你、你……」還沒來得及喊出名字，章已從五樓一躍而下。也是命不該絕，章是把馬路邊上的電話線攔斷了，接着落在放在廠門口準備去修理的乒乓球桌上，把五米長的桌面穿了個大洞，「安全降落」。領導「運動」的工廠隊長立即召集全廠職工，聲嘶力竭地宣布章為「現行反革命」。台上隊長演得「義憤填膺」，台下群眾卻都為「現行反革命」的「命大」。從此我他「死刀脫」（死不掉），他也欣然回應。問他是不是還想死，他慌忙搖手。又問他落地前在空中的一、兩秒鐘內想些什麼，他說當把第二條腿跨出窗沿前，腦子裡「轟」地一聲，眼前一團漆黑，已失去全部知覺。這是大實話。章君現在應已七、八十左右，祝他長壽幸福。

三起自殺事件

楊繼良



往事鉤沉

我們正在議論紛紛時，科裡一個小青年氣喘喘地回到辦公室。他那時說科裡「革命」，負責看管郭。他說，剛放下飯碗，郭突然走向五樓食堂敞開着的窗子，站到窗沿上，高呼兩聲某某萬歲，還沒有等這個小青年反應過來，就一躍而下。這個悲劇最可悲之處，是郭自己完全失去了活下去的信心，但卻要把活下去的機會留給家人；兩聲口號，希望家人不致被株連。小青年涉世不深，實話講了出來。當然，以後被「關照」，不敢再對別人講這一段實情了。

三起自殺事件，實在太冤。有一位姓楊的廣東人，小業主（小業主屬於小資產階級，是五星紅旗中的一顆星，但那時也作為批鬥對象）出身。同車間一個姓姚的開來無事，把一張有領袖姓名的紙，掩上了那個姓名，問「免崽子」（廣東人的口頭語）如何寫。楊君不知就裡，如實寫在指定的空白處。隔了幾天，那個青年說在字紙裏發現這個「反革命事件」。字跡核實，楊君也承認是他寫的，只是姓姚的不承認是他設下的圈套，反死死對認。楊被禁閉在五樓的一間小屋裡，半夜的圍審，此死，天有點冷，楊要求回家取棉衣。到家後，把存摺交還給十一、二歲的兩個孩子，說其中有一半是某阿姨的，叮囑孩子還給她。楊與前妻離婚後，和這位阿姨正談婚論嫁，阿姨拿出錢來，想要湊着添置一些傢具。我免死狐悲，格外傷感。跟「死不脫」跳樓後一樣，聲嘶力竭地宣布兩人為現行反革命。如果這個話作數，郭、楊想要庇護的家人和某阿姨還是要被株連的。幸虧現在也只作為帶着噁心的笑話資料了。

寫這篇短文前，我找那時的老同事「核實」。他說，這種事情多着呢；我們廠就這麼幾起，不算多。那位工廠隊長，和陷害別人的姚君，不知如今有沒有懺悔。轉而一想，他們也都正常，弱肉強食，叢林法則耳。想來他們決不會醒悟，在「文革」這齣大悲劇中，他們演的是丑角。

郭二起自殺，就不能當作笑話來講了。廠裡的郭二起工程師，就於愛國並謀求在大陸發展，解放初從台灣帶了一台舊的發報機回來。用賣得的錢取得一套房子的租賃權（上海話叫「頂」）。郭來自台灣、通發報技術，他精神狀態「候補反革命」隔離。反覆批鬥，他的精神狀態也變得非常，跟章君一樣，覺得活不下去，不如求一個「痛快」。一天午飯後，我在二樓的辦公室裡，聽到窗外「轟」的一聲，就像一麻袋的米從高處落地那個聲音。向窗外一看，有人仰面躺在窗沿上，蒼白的臉，已經變了顏色。兩三秒鐘後，此人七孔流血，這才悟出來。這正是郭工程師。